

回偶乡书

——“一名不敢还乡的哈尔滨小子的还乡记”

1

1993 年起，人生的前 18 年，我都在哈尔滨度过。那时候我的家乡真是个迷人的地方啊！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钱，也没觉得有什么所谓。

黑土地上特有的浓郁和爽快让人们一直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生活。即便是在城市里，也四处洋溢着乡村般的热忱和单纯。可能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的。国家的工厂，国家的店铺，国家的钱粮。当然，所有的问题、忧患、责任、错误也统统是国家的。大家留着啤酒、烧烤、纸牌、炖锅、糖葫芦、红塔山、貂皮大衣等为数不多的几种“自己的”东西，就可以非常快乐地生活了。边陲孩子的身子骨结实，在北风里能呼啦啦地跑，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来修饰。

我出生在国企的社区里。“厂子”就是一切。生病去厂里的医院，洗澡去厂里的公共澡堂，吃饭去厂里的食堂，打牌去厂里的娱乐室。作为一个普通子弟，我上了厂里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接受了货真价实的“九年义务教育”。那时候没人学习，大家忙着打群架，搞对象，上网吧……我算是个为数不多的异类：糊弄完作业再去玩、打架时胆小在边上偷偷看着、喜欢上老师家的女孩无从下手、手笨不会打游戏也不怎么会聊 QQ。但很幸运的是，我没有每天与习题和补课班为伴，而是在雪堆里，树上，大墙上，球场上翻来滚去。

如果当年我学习成绩稍微差一点点，就可以继续享受“厂子”的福利：去技工学校上学，毕业后去厂里当工人，迎娶一个还算漂亮的工友，把孩子生在厂里的医院。如果我的孩子淘气，就得买点礼物去找当年幼儿园的老师赔罪；如果他在学校闯了祸，我就得在家长会上一屋子的同事面前打他几巴掌，问他，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厂子进不去，怎么办？

幸运的是，作为一个一直以来的异类，我有了一些旁观者而不是中心者的习性。坦承地说，“厂子”哲学，并不只在东北出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中国的很多地方都被“厂子”占领。然而，这种哲学的影响，北方确实重于南方，东北又在北方尤为突出。以一种伪科学的口吻说，气候加固了这种哲学。寒冷限制了人和物产的活动范围，让关系变得绵密，让谋生方式变得单一，让计划经济与东北人民完美接洽，迅速扎根。

到这里，悲哀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后来，出了两件事。一件小事：“厂子”本身好像出了点问题。这件事其实在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那时除了几家大国企，一些中小规模的，来自于轻纺工业、食品工业、附属制造业等的“厂子”，已经走向不可逆转的衰弱。绝缘材料厂、亚麻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它们曾经在一块差不多五道口那么大的街区里密集而辉煌地接受共和国的洗礼，又仿佛一夜之间先后成了弃儿。

但是它们的坍塌没有对城市造成致命的打击。哈尔滨像它的名字一样，非常包容。这体现在，比如，我在离开城市两三年后，才间接了解到亚麻女工那段历史。人们没有沉溺于谈论痛苦。大家依然对“厂子”充满信心，因为老大哥们：哈电、哈飞，以及远房亲戚们：一重、大庆油田，还有吉林和辽宁的兄弟们，看起来都还活得不错。即便遇到一些困难，人们说，“大厂子不像小厂子，难道还能黄了？”

老大哥们真遇到麻烦，是最近几年的事了。不过，它们究竟遇到多大的麻烦，能否坚持过去，会不会重新振作，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出了一件大事。一件天大的事。

这件事是，大家似乎还都没有什么钱，但开始觉得，有所谓了。

2

讲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未必真实，但是他们的话都是我亲耳听见的，毫无虚构。

距离上次离开家乡一年后，我又回去呆了几天。

一个远方表叔知道在美国“念大书”的晚辈回来了，托我帮他办件事。他在国企干了一辈子，从工人干到小中层，眼看就要退休。他打算把这些年攒下的积蓄拿出来，买一间房子留给儿子。他让我帮忙参考参考。

我应了下来，在一个北风凛冽的早上拦了辆出租车，去中介看房。哈尔滨的出租车是要拼客的：即便车上有人，只要还有空位，司机们都会在人流密集的站台边慢慢地行驶，不停地摇下车窗来询问路边站着的人要去哪儿，是否顺路。这样做时，他不会询

问车上当前的乘客是否同意，因为这是一种行业的默契和习惯。这个习惯开始形成，差不多是在 2008 年左右，改革开放三十年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大家开始意识到，多赚一些钱是有用的。最开始的一部分司机发现拼客赚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新的“行规”迅速地蔓延开来。

我的司机摇下窗，询问路边一个站在积雪上等候的中年男人。那人见车上已经有人，摆了摆手。司机迅速地摇上车窗，一脚油门窜了出去。

“不坐拉基八倒，操。冻死你。”

他问了几个路人都不顺路。我想快点到目的地，就跟他说，师傅你开吧，我给你加个起车费。

“行，弟兄，讲究。那我就少挣点。”

作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堵城，哈尔滨几乎见不到立交桥；加之仅开通了一整条线的地铁，硕大的城市交通仅仅在平面上运转。不过，好几条地铁线路已经在加紧施工了，预计明年年底，几条新线路就可以同时通车。

出租车在一个拥堵的小道上爬行。我说，地铁修好了就好了啊，就不堵了，也方便。

“慢点修吧。修不好才好呢，修好了我们就没活儿了。”

我笑了笑，说，修好了，虽然你们活儿少了点，但是不堵了，跑得快，一天跑的次数就多了啊。里外里，还是对你们有好处。

师傅没有言语。又过了半晌，说：“修得慢，都是他妈的缺钱。钱儿给够了，早就修出来了。”

我说，算一方面吧，但我看主要还是工期短。哈尔滨冬天根本开不了工！一年只能干半年，跟别的地方比就修得慢。

司机又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他妈的钱儿不够。”

我打算换个话题。我问他，现在滴滴打车什么的你们用吗？师傅摇了摇头，说不用。我问为啥不用？

“现在都他妈不给加钱了，有时候还总抢不上单。我一生气就他妈给删了。还得是原始的操作好。新鲜玩意儿都他妈没啥用。”

我的微信响了，是那家房产中介的店员。他跟我同年生，比我小一个月，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之前一直在吉林从事家具营销，今年回来结婚，在家附近找了个中介的工作。

我点开了他的语音信息。

“哥你到哪儿了大哥？”

我说，我在路上，马上到了，别叫哥，你就比我小一个月。

“就是哥。哈哈。哪怕你比我小一个月你也是哥。哥你这样，你快到了就告诉我啊。”

说话间，出租车停在了路边。我转头看师傅，还没到呢，还有一段路？

“哎呀你下车走两步吧。就前头那个。再拐进去我出来太费劲。正好这路边有几个客儿。”

我瞄了一眼计价器，23，低头打开支付宝。我说，现在还得有燃油附加费呗，24 吧？

“嗯。”师傅含糊一声。燃油附加费前年就取消了，车上也不再有标贴。不过我也没再说什么。我按约定的加了起车费，推开车门。谢谢啊，我说。

“哎。走好啊弟兄。”

我跟中介兄弟并排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房主来看房。他点了一根烟，半倮着瘦削的身子，在走廊里踱步。他脸色有些泛黄。我问他，一天能抽几盒。

“抽不上，哥。粗的就两盒，细的就一盒。”

我很疑惑，细的为什么反而抽的少呢？他说，细的贵啊！我哈哈笑，说，那还是抽细的吧，还能少抽点。

“不行，细的太细，抽得不得劲儿。粗的抽得来劲儿。”他咧嘴笑：“等我以后有钱了，天天抽细的，抽三盒儿。”

我想问他为啥有钱了不干点别的，不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钱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得劲儿也是挺重要的。我点了点头。但我想来想去，终究还是没忍住，问他，有机会去北京看看，找找工作？那儿工资高，来钱儿快。他抽了口烟。

“我去过。有个朋友在北京，我前几年去过一回，面试还过了，干了一两个月吧。”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但是我感觉吧，北京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干活太累了。”

我说，那想挣钱不就得努力吗，哪有轻松的活儿能挣着钱的。

他又抽了口烟，诡谲地笑了。

“哥我告诉你个事儿，一般我都不告诉他。我准备，过了年就回长春，接着干家具。在那儿，我一天啥活儿不干，你猜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见我摇了摇头：“四千。我啥活都不用干，一个月给我四千。因为我有关系啊，我在那儿有人脉。我靠我这人脉，啥活儿都不用干。真的，四千，啥活儿都不用干。”

不久房主来了，我们看了看房子，那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临走他送我到店门口，又掏出一根烟点燃。

“哥，你一看就是个能挣大钱的人。我特别佩服你。”他有点害羞地笑了，咧开了嘴：“以后我也能挣着钱。等我啥时候上北京了，必须得找你去。”

我说没问题，微信常联系，然后跟他挥了挥手，跳上了一辆新的出租车。反正我们都还只有二十五岁。

4

中介的店主大哥告诉我，这片楼盘，今后两三年肯定看涨。

“因为这对面儿过道原来是哈药集团。药厂不好，有辐射，有毒，所以这片儿房子没人买。几个月前药厂开始拆迁了，以后建商业中心，这儿就涨起来了。”他转过头看着我，似乎也有些拿不准：“拆迁了估计毒啥的就没了吧，是不是？”

我笑了笑，问他，这片房子的入户费大概要多少钱呢。

“三四万，四五万，五六万左右吧。也就那样。”他垂下眼睛，没看我，翻了翻手机。我突然觉得“粗的两盒，细的一盒”的兄弟想当上老板还要修炼，他的话太准成了。

我看过房子，来到了物业办公室。一个对着手机照镜子的女孩抬起半张脸看了看我。

“你有啥事？快点儿说，我们要下班了。”

我低头看了看表，才两点多啊。我说，我想问一下这边的二手毛坯房，如果进户的话需要办什么手续。她把手机放下，在抽屉里找了一会儿，递给我一张打印的单子，抬头写着，某某物业进户费一览，下面列了一堆。她说，还要补交五年的物业费和包烧费。我问她为什么？

“人家就是这么规定的。这儿就是这么规定的，所有的都是这么交的。就都是这样的。”

我说，没进户入住为什么要补交这个钱？之前屋子是空的，供暖甚至都没开栓，为什么要补交钱？

“就必须交这个钱。我们这儿就这么规定的，都得交。不交你出不去这个屋。”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看《芳华》，但是显然我比刘峰怂了很多。如果你是在朝阳、浦东或者龙岗看的这部电影，你应该很难想象故事最后的那段镜头，竟然还在如今的东北发生着。显然，大家现在需要钱了，因为钱是个好东西。可是在这片计划的土地上，大家又不太知道怎么能正儿八经地赚到钱。“捞钱”和“创造财富”，是不是一码事呢？

我想来想去，觉得不是女孩的错。她不是“人家”，也不代表“人家”；她只是在完成工作，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女孩也许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离开家乡，偶尔回来的、小时候的男同学，而他们每次在家乡热烈地见面时都会发现对方仿佛还是那个人，又不再是那个人了。

微信里，微博上，人们好像未曾分开过。可是世界以不同的频率平行运转，慢慢把一些东西割裂开。

我窝在沙发里，试图概括这种感觉。她看着天花板，轻轻地说，我可能太恋家吧。我没有看她。她也许在对我说，也许在自言自语。她去南方上了大学，毕业回来父母身边；我隔壁家的姐姐当年也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哈尔滨好。上个月我去北京，我不喜欢北京。北京太大了，人太多了。”她说得很慢：“我觉得过得舒服是最重要的。我在家呆得舒服。”

于是我们换了一个可以进行下去的话题，我们开始聊起当年的自己和这么多年的自己。她讲给我，有一次碰到谁谁，谁谁现在在干嘛，谁谁进了厂子。她没说，但是我知道她现在在哈尔滨一定赚的比谁谁都多，工作也比谁谁都轻松。我听她讲完，觉得她现在在这儿的生活，确实挺舒服的。

我问她，觉得我变了吗；我有哪些地方，感觉不太对劲？她沉默了，轻轻摇了摇头。

“不知道。我无法评价你。”

我抓了抓她的手。我们都明白，那个时候，什么话题也进行不下去了。

如果还有机会，我想跟她说，其实我也想在一个城市里呆一辈子，不必担心外面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她是否能体会我多么羡慕北上广深的同龄人，甚至一个来自新兴县城的同龄人，只因为他们不必对抗故乡的衰落和下坠带给年轻人的深深绝望。

所有眷恋家乡的女孩，都是善良的。如果未来她们中的某个人遭遇不那么顺利的命运，便是家乡辜负了她。

5

我去了当年的高中。远方表叔不想把房子买在离他生活一辈子的“厂子”太远的地方，也不觉得房子买在哪儿，未来会在经济上有何区别。他叫我别跑了，那些街区都太远，不熟悉。其实地铁修好后，那里只要两站路就到他的厂子，而且我跟他说，厂子可能过几年就迁走了。电话里他笑着说不可能，你有事儿先忙你的去吧。

学校大概是一块萧瑟的土地上为数不多仍旧充满希望的地方。下午四点多钟，哈尔滨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教室里都亮着灯，学生们在课桌上做着各种小动作，看到趴在门上的我的脸，就一下子转过身坐正；大概把我当成值班老师了。其实我想跟他们说，快玩啊，玩得越淘气越好，我是来看教室里一锅粥的。

关于这一点，当年我的老师的感受是，现在的孩子，玩也不会玩，学也学不好。

“唉。现在的孩子，可不像你们那时候了。啥也学不会，也不好好学。有的整天就抱个手机玩游戏。我看他们玩也玩不明白。”

我端起一杯酒跟他碰了杯子。我说这其实挺正常，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孩子们不靠着那种想要改变命运的意志力来学习了，慢慢要寻找兴趣，选择变得多元，学习也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说到这儿，突然意识到说得不对。

对于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高中生来说，培养兴趣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无论他有多么高的天赋，在自己的兴趣上多么努力，可能都无法与北上广的同龄人同台pk。除非他的家庭充分优裕，父母充分支持，不然，他没有足够大的舞台。然而有这样客观条件的孩子，大多早就离开这里了。可能听起来很可悲，但是，在一个平庸而相对封闭的地方，天赋异禀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

努力学习，好好高考，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真的是唯一的出路，而且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如此。

意志力渐渐衰弱，依靠兴趣又没有可以成就的舞台，这也许就是那种“学也学不好，玩也玩不好”的状态。但是幸好，老师们还都在努力。他们依然尽其所能给孩子们积极的引导和培养。他们的苦衷和烦恼，只有跟毕业了的学生，比如我，才倒得出来。

“现在都不让我们老师活了。外面补课抓得太严。”

但是我知道，他在外面肯定还有课上。所谓抓得太严，可能是上的少了点儿的意思。市教育局明文规定不许老师出去补课，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条规定还都仅仅停留在纸上。

“那你说我们还会干点啥？不就为赚点钱么。我们又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上上课，孩子们听听课，我们赚点钱，多好。”

“总有家长告。今天找教育局了，明天找教育局了。有的家长，自己孩子上着课，回过头来举报老师补课。就想着法儿大家都别好。还有家长说，你就上节课，在黑板前面白话一个小时，就几千块钱？真是，没法让人活了。”

我同意他的话。跟拼客、供暖费和骗人的广告牌比起来，他出去上课赚钱，已经是相当正大光明的事了。我也理解他嫌恶“逼仄”的生活：不然又怎么办呢，别人都赚到钱了？难道因为我是老师，就必须占据穷酸的道德制高点吗？

难道因为我是医生，就只能赚死工资吗？难道因为我是政府职员，就得过得穷吗？现在可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啊！市场行为是要受到鼓励的。何况，当年选择从教从医从政，一方面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些职业比起那些“个体户”，油水可也不少。

然而这不是老师、医生或小公务员的错。2016年《Science》上一篇社会学研究里有一句话，翻译过来大意是，政策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为人们改变预期提供依据。这句话显然是说在“政治正确”时期的美国的，比较含蓄，作者其实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比如，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正确疏导人民的欲望。

老师说他新买了辆宝马，一会儿得找个好代驾。

“其实我就喝了一点。照以前，一点事儿没有。但是现在查得严了。”他沉默了几秒，点了一根烟，开始低头翻手机：“还是对的。社会还是在进步。我找个滴滴。”

“想想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老师，开的车还都是好车。也对，教委也该抓我们。”

6

在情感上，哈尔滨人拥有不胜数的优秀品质。比如，坚强果敢，热情好客，善解人意，任劳任怨……但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我们身上也有值得争议的地方；而且很有可能，这些情感特点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人发展的桎梏。当然，它们未必一定具有地域性——仅以我有限的视角来看，它们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次，并不是每一名家乡人身上都有它们的痕迹，但就群体而言，也许是广泛存在的；最后，任何有贴标签嫌疑的论调都难自净其身，“值得争议”，因为仅仅是我的一孔之见。

我认为这三种品质值得商榷；我把它们概括为，“动机正义”、“表里分明”和“部落忠诚”。

我家楼下的奶奶：一个在这儿土生土长、生活了一辈子的哈尔滨姑娘。她人善良，也很喜欢我，小时候经常在小区里打照面。没想到这次在路边遇见了她。奶奶身子骨还很硬实，在雪里走着也不费劲。

“你回来了？哎呀，回来几天了？怎么样，在外面累吧？”奶奶见到我十分激动，脱下手套，在冰天雪地里拉着我的手：“哎，你看这冻的，怎么不戴帽子呢。”她拉着我走到路边，要把自己的帽子脱下来给我。我连忙制止了她，她挣扎了一会儿终于放弃了。她讲起她的孙子，我初中同校的同学，现在在厂子上班。

“唉我这孙子，要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唉，现在的孩子啊，真是，不知道好赖。”

我问她怎么回事？小涛不是在厂子里工作的还不错？他的朋友圈都充满干劲，我经常看。

“威，不知道好赖。这不昨天还跟我吵吵来着，非说我把他的东西给收拾得找不着了。说跟我说了好几遍了没用。”奶奶突然情绪激动起来，用愤怒的眼睛看着我：“那你说，他那屋啊乱得跟猪圈似的，我就进去想给他规整规整，不对吗？他还不领情，说我把他的顺序给整乱了，东西也找不着了。真不知好歹，我是好心没好报。下回没人儿管他。”

我说小涛现在工作了，文件什么的都很重要，您以后啊可别随便进他屋子。

“咋就不能进了？又不是外人。我孙子的屋我都不能进了？外人我说啥不进。要进我都得敲门，这我比你们都懂。我还教育我孙子呢，在外面要整得像个人样。在家里五马长枪得怎么都可以，在外面就得装一装，别让外人笑话。”她好像忽然想起了

什么，抬起头严肃地对我说：“你也是，听到没？咱可不能叫外人笑话。家里人都无所谓，你咋的都行，在外面就得装得像个人。”

我笑着点了点头，但还是多了句嘴。我说奶奶哈哈，哪有什么里啊外啊的，怎么算是外人啊，我现在在外面朋友挺多的，我们平时也都挺好的啊，不咋分里外。

“你还是太年轻。得保持距离。你记住，跟任何人，要保持距离。除非是血缘关系。到啥时候，还得是血缘关系。你看我们老关家，到啥时候，都得是老关家的人，才能依靠，你懂不？外人不行，到啥时候都不行。咱就说，哪怕是你爷爷那边的，老赵家的人，也不行。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外人，再好，也是表面上的。记住没？唉。你还是太年轻。”

我含糊地说记住了奶奶！我们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跟你们一大家子不一样啦，没有那么多血缘关系。奶奶还要说些什么，我说诶正好给小涛发个微信，说着把手机掏出来，给小涛发了一条语音，说我见到奶奶了，正在路上聊天呢。小涛马上回了我语音。

“呀你回来了啊？哎呀咋不说一声呢。在家呆几天？内个…内个啥，你等我一会儿啊，我请个假，中午咱俩喝点酒去啊。”

我说不用啦，你别耽误事，我在家呆不了几天就得走，中午得去我表叔那儿，等夏天有机会再回来时间宽裕，咱俩再聚。小涛与我同校不同班，算是点赞之交里的近交，我翻了翻聊天记录，上一次是我们互致新春快乐。

“别啊。哎呀你办啥事去啊，快点的吧。咋的现在请不动了呗？中午你叔那儿能有啥事，中午我请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咱家里人得给你招待好了。”

听到被小涛当作“里人”而没当“外人”，我感到一点暖意。我也确信他确实是想招待我，不是想找我“办事”。我说小涛啊，我中午是真有事，我给我叔办了点事，中午要去他那儿汇报啊，都说好了。奶奶在一旁说哎呀你就去吧，让小涛请你，好心，他好心。

“啥事儿还能有招待你重要？你叔招待不好，快点儿的吧，”小涛不依不饶：“我这假都请完了啊可。怎么样，到不到位？”

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这顿饭必须去了。我不仅得去，还必须得让小涛买单，因为他“到位”了。

在东北，那些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度被证明有效且足够真诚的做事方法，会被认为总是“差点意思”。大概是不够投入感情。在这里，绝大多数人际交往准则统统无效；做事情一定要投入全部热情，全身心，单线程，表现出饱满的情绪和过度的热忱，才会被认可为“到位”。关于“到位”与否的标准，恐怕是世界上最难拿捏的尺度之一。

小涛到位了。这意味着，我也得到位，我们的关系才可以继续下去。我想了想，包里应该还有一支没拆封的签字笔，在 Logan 机场顺手买的。大概可以带着吧。

7

“兄弟啊，你是哪儿的啊？”一个蓝工装黄盔帽、手里捏着一个文件夹的大哥走过来。

“啊，我是咱子弟，现在在外面上学，回来参观参观。”我笑了笑，指了指面前的光荣榜。上面是一些季度“生产标兵”、“劳动能手”、“模范青年”的大照片。

“啊哈哈。你爸厂里的？你爸叫啥。”

我说叫啥啥，是隔壁车间的，都退休好几年了，你可能不认识。

“啊。那行，那啥，你溜达吧，你注意安全啊，戴个帽子。”他把头上的安全帽拿下来递给我：“你戴我这个吧我再去找一个，走时候你放门口就行。用不用我领你看一圈介绍介绍啊。”

我忙说不用，我自己转转就行。他摆了摆手走远了。

生产车间里到处都是铁。铁管、铁架、铁屑、铁块。花花绿绿的油漆斑驳地覆在各种机床的表面上，许多蓝工装和线手套在火星、机油、砂轮、滑车里上下翻飞。角落里的“抽烟处”围了几个提前完成生产，等着吹午饭号的工友。他们响亮的笑声在大大小小的铁架子上弹来弹去，充填了整个厂房。

是的，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彻底的欢快。这种欢快是可以传染的：在林荫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食堂窗口排着的长队里，在每一张饭桌上，笑声汇聚起来，漂浮在头顶的空气里，笼罩了整个厂区。排队打饭的队伍里，和埋头吃饭的桌子上，竟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手机。我认为这是集体主义的壮举。我也悄悄把手机揣起来。

厂子在衰落吗？如果它在衰落，是集体主义的衰落，还是人的衰落呢。

食堂大姐给“回来看看的子弟”在饭里多打了一勺鱼香肉丝，大概是想告诉他，人要吃得饱饱的，咱厂子还好着呢，有的是肉吃！

那个中午就在饱足、嘹亮和爽朗中过去了；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又一次踏上了离开家乡的火车。我记不起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几种感官同时被幸福地填满。大概是本科时候，同样在食堂里。食堂是集体主义的天才发明。

其实，虽然是厂里的“子弟”，直到上大学之后，我才进过厂子，这是第二次。小时候我好像也提过类似的想法，父母总说，厂里有啥看的，去看那干啥。

我猜他们小时候不带来，是怕我喜欢上这儿。他们都属于“厂子”里面比较进步和开明的人，这群人里包括绝大多数干部和一少部分工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以后可不能再进厂子，要读书，学知识，走出去。他们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

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没有足够进步和开明。对他们而言，“知识”就是学校的意思，是引力波、机器人、金融、网的意思，不是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不，这些不是“知识”，rocket science 才是 science。所以当你出于关心，试图就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理念、逻辑……提出建议或适当的纠正时，他们很少会听得进去。而出于对我的关心，他们也会用他们的逻辑来为我出谋划策。

“赶紧让你爸你妈给你攒点钱，以后你从美国回来了，在北京疏通疏通，找个工作，最好能留北大。可不能相信什么招聘啥啥的，我告诉你。那些都没用，最后还得是钱儿硬，关系硬。”

我说哈哈表叔你说的对，但是北京可能比咱们这儿稍微好一点，没塞钱没关系整不好也能找个工作。而且那钱太多了，得使劲攒，咱可攒不起。

“那再怂点钱不更把握吗？”表叔看了我一眼，似乎很不理解。他喝了口酒，换了个话题：“唉，你去厂里看一圈咋样啊。”

“唉，我也没去找你。现在厂里太严，出个门可费劲了，还得打卡，还得请假，干点啥都干不了，净瞎整。”

我说去了，看了一圈，中午还在食堂吃饭来着，人可多了。表叔咧开嘴笑了。

“厂子好吧！怎么样？唉，现在总说改革改革啥的，那你说，跟了厂子一辈子了，改革了，这些个工人干啥去？现在这样多好！”他说得有点兴奋：“我明年也要退休了。我在厂子干了一辈子。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我决定就在这片儿买房子，就厂子边上，老城区。老人儿都在这儿。你整那些地方都太远了。我看好一个。我告诉你，我今年六十万买了，过两年，至少涨到八十万。”

我点了点头。

我想起高高兴兴去吃饭的攒动的人潮，食堂桌子边互相夹菜的蓝工装恋人，沾满油污的工位上协作生产的师徒，“抽烟处”缭绕的烟雾里传来的嘹亮笑声；我想起黄色安全帽和鱼香肉丝。我觉得，一辈子的老职工，退休后不离开厂子，这是一件毫无争议的正确的事。这种感受，是二十几岁的我即便努力体会，也无法充分感受到的。

厂子是一个从青年时代一直陪伴到花甲之年的朋友。它强壮，包容，浓郁，质朴，足够生动，也足够广袤了。人一生又能交下多少个熟人呢。

厂子里的人，尽管知道如今相比之下自己有点儿囊中羞涩，却是万万瞧不起那些离开“计划”、转而从事“市场行为”的人的：他们“心眼儿太多了”。伴着厂子度过一生，就可以不用学习这个世界的复杂。不必勾心斗角，不必虚头巴脑，不必尔虞我诈。每个厂子都是个桃花源：从进入它的第一天起，就可以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继续做个嬉笑怒骂、感情充沛的孩子，并且一直高昂着变老。

只要厂子还活着，这群人就有生活的意义；厂子没有了，他们的生活就被剥夺了。厂子是一代人的芳华，还是他们芳华的前提。

可是，厂子的本质是企业，是“店”。

前面加了“国”字，会让它坚固一些；但只要它的本质是“店”，便在瞬息万变的商业里沉浮，便注定有兴有衰，便不像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可以有理由一直存在下去。

只是这个道理，在计划的年代，没人主动告诉他们；现在时代变了，他们知道了，可是他们老了，没办法心甘情愿地相信。

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知道，而又不愿相信、或者不想适应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进出厂子应当请假和打卡，比如喝过酒不能开车，比如孙子的东西不能乱动，比如补收供暖其实是乱收费，比如燃油附加费其实已经取消了，比如虚假广告其实是坑人的，比如厂子正在迅速走向衰落、即将告别历史舞台，而那些“正经的市场行为”正在登上新的舞台，因为时代真的已经变了。

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大致出于两个原因：自由和钱。换个角度讲，只有一个原因：束缚。在制度和教育荒芜的年代，人们习惯了不受束缚；而如今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把人束缚得够呛！再加上钱的束缚，简直无法忍受了。以前多好，以前大家人人都一无所有，所以其实拥有一切！

可是，我们不能永远一无所有，不能永远一无所获。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表叔喝醉之后举起酒杯，看上去在对我说话，其实在自言自语；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绝望，应该算是我听到过、最深刻的绝望之一了。他咽下一口酒，直直地看着桌子，说：“你们北京的道理，就一定对吗？就永远对吗？就肯定对？你们再怎么着，也得有个不对的时候吧？”

我热爱我的家乡。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充满繁荣和活力，一直闪耀在舞台中央呢？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一个状态，比它现在的状态，更接近“病入膏肓”这个词的意思了。

我的家乡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坠落。每年，有无数人离开这里，选择做一个无奈的异乡人。他们去北上广深、去海口三亚、去苏杭宁、去武汉成都、沈阳大连……城市在失血，在加速失血。曾经，这里人们的娱乐活动只有走亲访友，然而在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的夹击下，这最后的娱乐活动甚至也无比艰难了。

如今，城市里只剩下面面相觑的老人。

老人或许还在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帮助着独子，因为他们大概是儿子唯一的依靠。毕竟，这座城市可是共和国长子，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堪比如今的城镇化水平，执行国策自然是最为彻底的地方。

如今，城市里只剩下面面相觑的老人。他们就像这句话一样单薄。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没有读《Hillbilly Elegy》。后来我把它读完了。全世界的挽歌大同小异。阶级斗争是故去的词语，是因为“斗争”二字不该存在，而不是另外两个字。显而易见，东北便是中国的铁锈带。然而，拉长时间的视角，在任意一段历史进程里，兴衰都是最正常的事情：今日红红火火的CS工业，也许就是未来的铁锈带，或者“硅渣带”？今日西二旗和马连洼熙熙攘攘的“新厂子”们，也许未来也将复制“老厂子”的命运？

可是，囿于气候的因素，东北没有中原或海滨那样的流动性：人们对于兴衰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回复力。在冰天雪地里，我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适应变化，我们渴望一种一如既往的，部落式的、浓郁的、稳定的常态。我们更容易在时代更替中陷入悲哀。

在悲哀中，在被网络社会加速唤醒的经济劣势裹挟着的惶恐、无奈、焦躁和沮丧中，慢慢地，一些道德被妥协了，一些尊严被放弃了。尽管美德在这座淳朴的城市依旧比比皆是；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十年，这件天大的事确实发生了。而我认为它是事情恶化的根源。我极不情愿地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所谓穷，便凶，便有了极恶。

另一件我极不情愿承认的事是，在一直被渴望的那种，一如既往的、部落式的、浓郁的、稳定的常态下，也许隐藏着一些值得争议的情感和行为模式；这些模式也许促成了家乡人如今的大多数悲剧，也拖住了他们走出泥潭的脚步。

最近有一条新闻引起热议。“黑龙江死刑犯行刑前与亲人作别”：李某某替在 ktv 吵架中占了下风的朋友出头，开车疯狂追逐并冲撞对方的车子，造成对方翻沟起火，三死二伤，被判死刑，临行前被民警带回家，与亲人跪地道别，劝妻子改嫁，请母亲节哀。如果没有在东北生活过，你觉得这段话里是不是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在东北真实发生着的魔幻现实主义，大概可以超越所有作家的想象力。也许是由于气候和饮食习惯的原因，东北人“气性大”；在一块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肾上腺素又被酒精、黑夜、寒风刺激得异常旺盛的地方，人们习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使用冲突来尽力释放荷尔蒙。大家做事情对于感情和直觉的依赖要远大于理智和契约。人们好像都不怎么关心事情的结果，而在乎另外两件事：事情的情感因素是否饱满，是否足够“争气”、“像样”和“到位”，以及，人的关系是否充分浓密。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便有了“替朋友出口气”这件魔幻却广泛的事；便有了“动机正义”、“表里分明”、“部落忠诚”，以及在它们的夹击下的，那些困在笼子里的人们。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离开家乡后，每当在国家级媒体上看到有关它的报道，都会忍不住一点激动。

我想，大概每处家乡，登上头条都有特殊的套路吧？

我这么想是因为，几年来我发现，“哈尔滨”或者“黑龙江”的字眼，出现在新浪和搜狐的方式，十分稳固。比如最近一个月：“雪乡导游殴打游客”、“北京学生去雪乡途中翻车”、“企业家控诉亚布力管委会”、“哈尔滨荣膺中国堵城第一名”、“黑龙江成为首个养老金结余被花光的省份”……

这不是媒体人的错。尽管这些新闻加剧了恶性循环，但他们的负面印象不是空穴来风。

而新闻以外，现在描写东北衰败现状的文字、影像也有很多；它们唤起人们对于这片土地的同情和注目，带着伤痕文字特有的病态美和深刻感。可是当我阅读那些文字，并且看到文字之间的图表、数字、理论…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为了发现问题根源并寻找解决办法，我希望在恢弘的视角旁边，作为补充，增加一些微观观察。我认为声音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角度：我把自己听到的，引发我思考的，原原本本地转录出来。

每一段声音的主体，都是如今在我家乡里真实生活着的人。他们的声音像刻刀；从不同的侧面，一刀刀下去，也许这座城市的状态便可以初露端倪。这便是这篇文的初衷。

自从 18 岁离开哈尔滨后，现在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到一周。每当临别时，与故乡不欢而散的感觉，应该是人能尝到的，最痛苦的事之一了吧。

不是他乡。不是故乡。是偶乡。

直播和电竞的兴起，对于东北来说，是一壶药酒。如果几十年后回看历史，证明这些产业拉动了普遍消费，最终为东北注入走出泥潭的活力，这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它们为东北人终于提供了一种光明正大又相对稳定的赚钱方式：“厂子”可以被取代了；或者，“厂子”之外，有正经钱可以赚了。在这片土地上，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新产业诞生，这也许是第一次。

还有，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了“老年教育”这个词。好像以前从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形式，冒着晚辈的大不韪，冒着不到位的风险，给家乡的亲人师长朋友介绍让他们不适应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理念、逻辑…我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能做什么？

但还是，怀着希望吧。

希望的人多了，可能，就好了。

2018 年 1 月 于朝阳